

論一九二八年《公教報》創刊的宣教意義

林瑞琪

(筆者按：本文曾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香港建道神學院合辦之第二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上宣讀，二零零一年五月增刪為現稿。)

引言

香港天主教《公教報》為香港天主教會所主辦的中文報刊，創刊於一九二八年，在香港宗教界的刊物中可算歷史悠久。^(一)而即使與香港社會上

其他商辦報章比較，亦可算是老資格的報刊之一。

^(二)然而，《公教報》創刊雖有如此綿長的歷史，然而其誕生卻較香港天主教開教（可遠溯至一八四一年英軍尚未正式進駐香港之前^(三)）遲了足足八十七年。

天主教自一八四一年正式傳入香港。但直至一八七七年，才出現第一份天主教報章“*The Hong Kong Catholic Register*”，中文名為《香港天主教紀錄報》。對比於基督教方面，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等人來

港後不久，即創辦中文報刊《遐邇貫珍》，天主教在這方面明顯落後於人。

天主教會在報刊傳播上的反應緩慢，並非香港會獨有的現象。整個中華大地的天主教會，對報刊傳播功能的重要性，一直不甚重視。事實上，自一五八二年利瑪竇來華時算起，中國天主教會似乎未有想及出版報章刊物。據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的谷長嶺教授稱，前述的《香港天主教紀錄報》半月刊，是天主教在中國出版的第一份報刊。^(四)換句話說，在這之前的二百多年間，中國天主教會在新聞出版方面，可以說一直在交白卷。即使這份《香港天主教紀錄報》，本身的對象亦僅限於以英語爲主的香港、上海及日本等較爲西化地方的教友。^(五)對於以中文爲母語的香港本地教友。直至一九二八年《公教報》面世時，才首次有屬於他們的報章。

早期香港天主教出版業簡史

前述《香港天主教紀錄報》，是天主教香港代

牧區^(六)所辦第一份報刊，創刊於一八七七年九月廿二日，由聖類斯教導所印刷。^(七)一九一四年，一位名爲 G. M. Pereira 的葡國教友出版了一份名爲“RELIGIAO e PATRIA”的葡文天主教刊物。^(八)

一九二零年，香港的天主教信衆又創辦了英文天主教刊物，名爲《磐石》（“THE ROCK”）。該刊物雖爲天主教報刊，但並非由天主教香港代牧區直接負責。出版機構是天主教聯會（CATHOLIC UNION）及男教友聯誼會（CATHOLIC MEN'S CLUB）。早期的編輯人員及經理人員以英軍軍官及政府官員爲主。^(九)一九二八年起，《磐石》改由耶穌會神父負責。^(十)

此外，天主教香港代牧區尚有兩份小型刊物，一爲「祈禱宗會單張」（“Leaflet of the Apostleship of Prayer”），每月以中、英、葡三國文字印行，是專爲「祈禱宗會」會員而設，方便每日祈禱的印刷品。另一份是“REVEILLE”，是爲英語天主教徒而設的八頁小冊子，同樣爲每月出版。

《公教報》創刊的教會背景

從上述的報刊陣容而言，香港天主教會的出版事業，始發於十九世紀末，而在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才漸見積極。但中文天主教報刊仍要待至一九二八年才出現。有其歷史因素。其中更可分為教會方面的因素及社會方面的因素去探討。

教會內的因素，主要繫於中國天主教的本地化發展。以下三事為明顯代表：

(一) 自清政府解除教禁之後，天主教羅馬教廷一直有意與其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事情進展一直受法國所從中作梗。直至一九二一年，教廷才有機會委派正式的宗座駐華代表。首任宗座駐華代表剛恆毅總主教 (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 於一九二二年底到達中國，設立宗座代表臨時公署於武漢。剛總主教對中國文化甚為重視，亦致力中國教會本地化運動，中文在教會

內的地位於然提高。^(十二)

(二) 剛總主教於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召開主教會議，與會者當中首次有中國籍的教區，包括湖北省蒲圻教區成和德監牧及河北省蠡縣教區孫德楨監牧。會議議決在中國全國成立十一所總修院，培養高水準的中國籍教牧人材。

(三) 一九二四至二六年間獲委任的中國籍主教，在羅馬由教宗庇護十二世親自祝聖為主教。這是遠東地區首次有本籍主教在羅馬晉牧，中國教會因而備受世界重視。

這一系列的事件，大大提高了中國教會在全球天主教會中的地位，亦促使中國文化在教會內備受重視。中文天主教報刊的出現，回應了中國教友在本地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訴求。在此之前，早在一九一五年，在天津的比利時籍傳教士雷鳴遠神父 (Fr. Lebbe) 創辦了中文的天主教日報《益世報》，並取得極佳的銷路。^(十三) 這可以說天主教中文報刊與中

國天主教會的本地化，是相輔相成的。

《公教報》創刊時的香港社會背景

教會以外，華人及華文在香港地位的提高，亦促成了香港天主教會深切考慮創設中文報刊的必要性。一九二五，「省港大罷工」令到香港一時為之癱瘓，發揮了華人的團結力量，令到香港人意識到自我的價值，敢於向外爭取。^(十三)

一九二六年中國國民黨革命展開，北伐進展迅速，令到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迅即提昇，中文的重要性亦因而提高。

此外，一九二六年，留學美國後回港工作的周壽臣獲委為香港行政局首位華人非官守議員，反映出社會進展華人領袖的冒起。碰巧當時的香港總督金文泰醉心於中國文化，是總督中少有的中文通，於一九二七年，金文泰總督敦促香港大學開設中文系。^(十四)這一系列事件的影響所及，天主教會亦得反思其對中文傳播媒介的運用方針。

《公教報》的創刊理念及其市場定位

《公教報》的創刊，得歸功於首任主編顏思回神父（Fr. Granelli）。一如十九世紀多份基督教中文報刊由外籍傳教士發起，《公教報》的發起人同樣亦非中國人。顏思回神父原籍意大利，一八九二年生，屬米蘭外方傳教會會士（該會後來改名為宗座外方傳教會），一九二零年到達香港。顏神父創辦《公教報》的第一年，深得中國籍司鐸盧履中神父的協助。然而，他們的緊密合作，卻因一九二九年盧履中神父調往廣東惠陽縣淡水鎮主持教務而告一段落。^(十五)按當時的教務劃分，惠陽及海豐一帶，歸天主教香港代牧區負責。

《公教報》自創刊開始，一直強調其教化的功能。在天主教會的信念中，改善社會教化的最佳途徑，又莫如宣揚教義。因此之故，匡扶社會風氣與促進教務發展，成了《公教報》二而一的辦報目的。這些理念，都可在其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的發

刊辭中可以見到。其發刊辭如下：

今之留心教務者，莫不以教育為公教進行唯一之要素。不知報章實為人民之長期學校。又為人生第二空氣。其潛移默化力。強於學校遠矣。故欲助宗徒事業。日益發展。舍此末由。當茲人慾橫流。邪說蠱起之秋。非有名言至理。發揮一切。實無以糾正人心。光揚聖教也。報章之對於教務前途。裨益宏大。第念同人等。志微力絀。學識謫陋。不揣棉薄。發行月刊。尚望閱報諸君。時賜教言。以匡不逮。尤望盡量鼓吹。使得風行一紙。庶幾於榮主教靈。得收宣傳合作之效。則拜惠良多矣。^(十二)

與前述其他天主教外文報刊不同，《公教報》與香港代牧區的關係十分密切。創刊號第一版大部份篇幅，用來刊登「香港主教致本屬教友書——論公教與中國 耶穌信徒對於公教應盡的責任」。該文延至第二版（即第二頁），所佔篇幅甚長。

《公教報》在香港傳教區內的角色，可從《香港代牧區手冊 *Vicariate Apostolic of Hong Kong* (1929)》當中「天主教報刊 *Catholic Press*」一欄中描述可以得知。

4. The "Kung Kao Po" 公教報 (Started in August 1928) .

It is a Chinese newspaper, intended to give news of Catholic life in the Vicariate of H.K. and the rest of Christendom; but mostly to strengthen the Faithful and to illuminate the truthseeking pagans, by means of apologetic articles.

It is published for the present once a month, in 8 pages, illustrated.

Address: c/o Rosary Church, (Telephone No. K.402), Chatham Road, Kowloon.

中文意譯如下：

4. 《公教報》(創刊於1928年8月)其為一份中文報刊，旨在提供香港代牧區內以

天主教徒以至其他地區基督信眾的生活新聞，但最重要的，是藉著護教學的文章強化信眾以及光照尋找真理的外教徒。）

《公教報》創刊時期的發行策略

《公教報》初創時為月刊，至一九三八年改為半月刊，其後幾經變遷而成為今日的周刊。一九九八年《公教報》創刊七十週年時，報館方面出版了社論專輯以資紀念，當中「編者的話」對《公教報》的發展有扼要的敘述。

《公教報》創刊時，標明日期為「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一號，戊辰年六月十六日」，反而沒有採用公曆紀元，可以反映出主編趨近中國的心態，也可以反映出其對當時中國國民革命的認同。

創刊之初，《公教報》的版面的對開大紙一張半，共六頁。版面約為十五英寸乘以二十點五英寸。其後增至兩紙八版。^(十七)一九三七年開始印四小張十六版，到一九九八年底為出紙七小張二十八版。

^(十八)從版面的尺寸而言，《公教報》一開始即有大報的格局，雖然僅僅每月一期，但不能視之為雜誌，而應列其於報刊之中。

《公教報》版面的特色之一，是其「報頭」異常地巨大，竟佔整個第一版（即第一頁）的十份之三。以對開對摺的版面計算，面積達六英寸乘以十四英寸，為當時中文報章所罕見。與同時期其他報章比較，《公教報》的「報頭」顯得非常奪目，對吸引讀者起著重要作用。^(十九)

《公教報》創刊之初，發行情即達八千之譜。^(廿)其後在兩年之內，銷量已超過一萬份。一九三零年六月一日的《公教報》第一版（即第一頁）「本報啓事三」有云：「本報持論公平、紀載翔實、屢蒙社會人士所嘉許、故每次出紙、銷售萬份有奇。」在當時來說已是一個不錯的數字。

由於資料所限，我們現在無法知道一九三零年在香港的天主教徒人數。但按一九三五年的資料，天主教香港代牧區（包括海豐、惠陽一帶）共

有教友三萬二千九百二十一人。而當時每年學習天主教要理準備進教者，每年約一千三百人。^(廿二)由這些數字推算，則一九二零年香港代牧區的教友人數大概約在為二萬五千至二萬八千之間。以這個數字看，香港代牧區根本無法完全消化《公教報》每期所發行的一萬份報章，一萬份明顯是超出香港天主教會的需要。由此可見，當時《公教報》的發行範圍，一則是超出香港地域，向其他地方華人天主教徒推廣，一則是在香港能為非天主教徒所接受。實際情況也許是兩者皆是。

由幾則刊登於早期《公教報》的廣告，可以反映出上述兩項推斷的可能性均存在。一九二零年一月三十日一則廣告上書：「此乃上海老晉隆洋行廣告地位」，^(廿三)一九二零年九月一日一則「韋廉士紅色補丸」的廣告，內稱：「韋廉士紅色補丸……遠東總發行所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廿四)這些廣告，均反映出《公教報》在上海以至其他城市深受

歡迎，反映其有擁有一定的讀者眾，否則這些遠在香港以外的商戶，不會出資承購這些廣告版位。由此可見，中國各地的天主教徒，不少為《公教報》之忠實讀者。

此外，《公教報》在創刊伊始，青洲英坭公司一直在《公教報》上刊登廣告。^(廿五)此類廣告與一般日用商品廣告不同，對教友並無作用。青洲英坭乃建材公司，其客源乃為少數建築商或承包商，與一般市民並無直接關係。這類廣告主要作用在於強化在社會人士心目中的善意形象，並無直接擴大銷路的作用。傳播學家 Stuart Price 在其近著《Media Studies》(2nd Edition) 中將電視廣告分為二類，第三類是「不直接售賣產品，而是著重宣傳公司形象。」^(廿六) Price 的分類亦適合於解釋何以青洲英坭公司的廣告會出現在《公教報》之上。但在此必須補充一句，要以廣告宣傳公司形象，必須尋求有公信力的傳播媒體才能發揮功效。由青洲英坭的廣告可見，《公教報》擁有重大的社會認受性，有助於

廣告商建立善意的形象。

談到社會認受性的問題，現任《公教報》總編輯夏其龍神父曾在一項研討會上謙稱有些廣告純粹是出於商界的善意，作為對《公教報》的資助而已，並非要借助《公教報》以建立形象。筆者在此不能否認夏神父所說確曾發生，但套用在青洲英坭的廣告上卻並不成立。筆者重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零年的《公教報》，青洲英坭公司一共設計了四款廣告。假如該公司只是將廣告視為對教會的捐助，則無需如此勞師動衆。

創刊時，《公教報》並不收費，其創刊號的「本報啓事二」申明：「本報為推廣普及起見，故不收報費，但恐日久經濟有缺乏之虞，仍望閱報熱心善士、量力襄助為荷。」又「本埠每年郵費壹元外埠二元。」

《公教報》早期不收報費，但依然能夠生存，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其印刷成本甚廉。當時香港天主教會在西營盤第三街接辦聖類斯實業學校。

《公教報》即交由該校承印。^(廿七)該校以實習生為主，所以成本可以從廉。另一方面，《公教報》在廣告方面有頗豐厚的收益。由於現時再找不到當時留存下來的廣告交收記錄，因此無法精確計算上收益，但從第一期至第三十期的版面計算，《公教報》的廣告收益可以說十分豐厚。

《公教報》在本港及普世教會中的地位

《公教報》創刊不久，即深受教會內人士的重視。其影響力更遠至羅馬教廷。其中一九三零年三月一日的第二十期第一版刊有羅馬教宗的嘉許。當時的教宗為庇護十一世。有關的嘉許報導全文如下：

本報去年曾將一九二九年出版、彙成篇軸、寄由味蘭人傳教會會長、轉呈宗座。教皇接閱、大加贊賞、以本報發刊未久、竟能出紙至萬數千張、乃立諭該會會長、來函嘉許。并降福本報主任。記者。及閱報諸君。

以其能成全此等偉大宣傳工作、俾教外人、得聞聖道、教內人、得堅信德、同人等膺此特獎之下、欣慰之至、敢不光踴勉將事、大加刷新、尤望閱報諸君、在親友中、再為介紹、多訂本報、冀得教皇降福。不勝欣盼之至。^(廿七)

目前稍為可惜的是，創刊主編顏思回神父在《公教報》上從來對自己隻字不提。這是出於天主教會神職人員謙下的傳統，亦是強調教會集體負責的表現。但正因此，今日我們對顏思回神父所知的並不多。即使《公教報》七十週年紀念的特刊《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的附錄二當中，亦只能無奈地寫著「主編資料不詳」。^(廿八) 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有關顏思回神父的資料，大多來自三十年代各冊《香港代牧區手冊》，顏神父在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任職九龍太子道聖德肋撒堂主任司鐸，^(廿九) 同期的《公教報》報址亦遷往太子道聖德肋撒堂，可看當時報刊對主編個人的依賴頗

重。

事實上，《公教報》主編避談本身的地位，已成為報社方面的傳統。歷任總編輯當中，只有由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五日出任上述職務的張家興先生，曾在《公教報》第一頁印上自己的名字。^(卅)

天主教與基督教對文字傳教的不同考慮

雖然本文簡要地闡述了《公教報》創刊背景及初期的辦報情況之後，筆者希望稍稍探討前述的一項歷史問題：何以基督教會來華遠較天主教會為遲，但在報業發展上卻有其創新的表現？

面對這個問題，筆者嘗試從傳教策略的差異方面入手。天主教會自十六世紀末傳入中國以來，大部份時間雖然經歷政治上的壓制，但傳教事業並未因而中斷，期間更有長足進步。十九世紀初的四川會議可以作為一例。當時天主教會雖受到清廷政府的壓制，但光在四川一省，教友人數已從一七五

六年的四千人，增至一八零四年的四萬五千人；神父人數也由兩人增加至二十人。^(卅二)

在這些困難時期，由於公開宣教並不容易，傳教方法通常依靠「人對人」的傳播。^(卅二) 現實的結果是，天主教會在中國組織了不錯的人際網絡。相反，十九世紀初基督教會進入中國之時，仍處於禁教階段的末期，基督教會在中國缺乏了天主教會所具有的深厚人際網絡，於是需要依賴文字工作來開拓傳教空間。

李志剛牧師在其所著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香港的傳播與影響」一文中第四部份「香港基督教與近代中國」，談及一八四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四日的一次跨宗派會議，其主要內容如下：

倫敦傳道會、公理會、浸信會、美國長老會均有西教士代表出席會議，主要討論各教士進入中國五口岸翻譯《聖經》的合作計劃。如此一則有助於對中國各地方言的認識；二則有翻譯本便於對《聖經》解釋的一致性；

三則他們理解到用書報對中國傳教所發揮的功效。所以在一八六零年前，基督教士多使用文字傳教，以派發書報，單張作為他們與華人接觸的橋樑。^(卅三)

李志剛牧師的文章清楚指出，基督教會早在十九世紀前來向中國人傳教時，經已積極運用文字及印刷媒介為宣教工具。

《公教報》對香港天主教傳教工作的影響

承上所說，印刷刊物在基督教會方面成了有力的傳教工具，《公教報》對天主教的傳教事業，同樣有促進傳教活動的功用。《公教報》的創刊，改變了天主教單獨依靠「人對人」的傳教方式，轉為「人對人」及「人對社會」的雙線發展。這對日後在天主教會融入香港的華人社會，有一定的幫助。

《公教報》創刊後，為天主教知識份子提供了一塊重要的園地，令到他們可以在教會的刊物入

談論信仰，三十年代以來，天主教作家及學者，不少都在《公教報》投稿，甚至應邀設立專欄，他們包括蘇雪林、方豪、黎正甫、思果、黎潔如、劉健、陸鴻基、黃康顯等等，以及筆者一時在手頭上沒有資料而未能補充的衆多名字。

《公教報》所採用的傳教策略，並不在於正面傳教，而在於與中國文化接合。在這一事上，不容易判斷其成敗。但無可否認的是，《公教報》當年創刊者的遠見及勇氣，是值得我們後輩所學習的。

《公教報》的出現，與天主教本地化是相輔相成的。文化事業往往反映出社會的發展脈絡，天主教會在一九二〇年代感受到有本地化的衝擊，產生了正視本地化需要的天主教會，才孕育出本地化的天主教文化產品。

結語

從天主教會對出版事業重要性的緩慢反應看

來，天主教會由於擁有較健全的人際網絡，對以報章及文字傳播媒介的依賴相對較小，在考慮發展報業時反而偏向謹小慎微。基督教會從零開始，一無所有，所以反而勇於創新，大膽冒進。各有所得，難以判斷高下。

另外，從年代次序上看，天主教的報刊事業對比於基督教，起步要遲得多。但《公教報》的出現，也反映了天主教會的一貫作風，「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公教報》出現得遲，卻更能歷久不衰。天主教創辦事業，必待其條件成熟，然後事半功倍。反觀基督教會方面，辦報事業此起彼落，但都不能長久。前述的《遐邇貫珍》，從一八五三年八月一日創刊開始，只出版了三十二期，到一八五六年五月便停刊了。^(卅四)雖然在二十世紀初期，香港基督教徒所辦的日報《大光報》曾一度十分成功，^(卅五)但似終未能長久維持下去。

《公教報》的歷史，反映了天主教會的一統心態，一而專，集合力量，幾至可與民間商辦報章

的實力等量齊觀；基督教的辦報卻是多而分，各自為政，辦報方針自由，似乎近於知識份子辦報的形式。

天主教會辦事講求集中全力，非但香港使然，在中國大陸上亦如是。二十世紀初的《益世報》，也同樣綿延久遠，直至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後，才因政治原因結束。

當然，天主教會和基督教會各自有不同的方針。形成了對社會的不同影響方式。基督教會重視大鳴大放，天主教會重視細水長流，各有優點，不能從此而下判斷。即使談到對報業的影響，《遐邇貫珍》的重要性，可能遠在《公教報》之上，不因其報壽甚短而有損其歷史價值。 □

註釋：

- (一) 參閱田英傑編著《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 1983年

版，第二十七章「最初的天主教報章（一八七七年）」，頁127。

(二) 隨著華僑日報於九十年代中期停刊，《公教報》已成為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中文報章。較之第二名的《星島日報》更早了足足十年。

(三) 同註一，第一章「第一份文獻（一八四一）」，頁1-3。

(四) 參閱方漢奇、張之華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簡史》（第二版）「第二章 近代新聞事業的傳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第2版，頁52。

(五) 同註一，第二十七章「最初的天主教報章（一八七七年）」，頁127-129。

(六) 代牧區是天主教會在地地方上的一項教務劃分。天主教於一八四一年傳入香港時，即成為香港監牧區，到了一八七四年，香港監牧區昇格為香港代牧區，首任宗座代牧高神父於同

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祝聖爲主教。香港代牧區於一九四六年與全中國其他百多個代牧區一同昇格爲教區。有關該等歷史，請參閱《香港天主教手冊》(1998)，香港公教真理學會1998年版。

(七) 同註一，第二十七章「最初的天主教報章」，頁127。

(八) 同註一，第四十三章「天主教報刊(一九二八年)」，頁200。

(九) 同註一，第二十九章，「『磐石』月刊(一九二零年)」，頁179-181。

(十) 同前註，頁181。另請參閱 *Vicariate Apostolic of Hong Kong* (1929)，頁19。

(十一) 參閱羅光總主教著《教廷與中國使節史》，台北光啓出版社，1961年8月初版，頁224-227。

(十二) 參閱趙雅博著「雷鳴遠與中國」，台中衛道中學1990年3月第六版，頁9-11。

(十三) 參閱劉蜀永主編《簡明香港史》，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4月初版，頁156-165。

(十四) 同註十二，頁176-179。

(十五) 參閱 *Vicariate Apostolic of Hong Kong* (1930)。

(十六) 《公教報》創刊號，1928年8月一號(等同一日)，第一版(等同第一頁)。

(十七) 參閱《公教報》1929年各期。

(十八) 同註十七。

(十九) 戰前香港主要報章的「報頭」，可在李家園著，

三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香港報業雜談》一書中找到。包括《華僑日報》及鄒韜奮所創的《生活日報》等商界或政界報刊，都沒有運用《公教報》那麼碩大的「報頭」。

(廿) 參閱田英傑著游麗清譯《香港天主教掌故》，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聯合出版，1983年12月初版，頁201。

- (廿一) 參閱《中華全國教務統計 *Annuaire des Missions Catholiques de Chine 1937*》，上海徐家匯光啓社 1937 年版，頁 B26。
- (廿二) 《公教報》1930 年 1 月 31 號（即一月三十一日），第十八期，第六版（即第六頁）。
- (廿三) 《公教報》1930 年 9 月 1 號（即九月一日），第二十六期，第三版（即第三頁）。
- (廿四) 參閱《公教報》1928 年至 1930 年各期。
- (廿五) 參閱 Stuart Price 著 *Media Studies (2nd Editi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8, p.166. 原文為 Ads which don't sell anything, but which propagate a corporate image.
- (廿六) 《公教報》1931 年 1 月 1 號（即一月一日），第三十期，第一版（即第一頁）。
- (廿七) 《公教報》1930 年 3 月 1 號（即三月一日），第二十期，第一版（即第一頁）。
- (廿八) 參閱《鐵筆七十年——公教報社論選輯》，香港《公教報》出版，1998 年 10 月，頁 202。
- (廿九) 參閱《香港代牧區手冊》1934、1935、1936 年各冊。
- (卅) 《公教報》1999 年 8 月 15 日是封面印有主編名字的最後一個例子。
- (卅一) 參閱任致遠著，游麗清譯「一八零三年會議前的四川教會」，收錄於《鼎》雙月刊，1983 年 6 月總第 15 期，頁 16-27。
- (卅二) 同註卅一，頁 23-24。
- (卅三) 該文收錄於王廣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下冊，見頁 767。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7 年 7 月初版。
- (卅四) 李志剛著《香港教會掌故》，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1992 年 6 月初版，頁 35-36。
- (卅五) 同註卅四，頁 119-122。